

CHINA DREAM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

与大学生谈实现中国梦的自信和自觉

陈锡喜 著

人民出版社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

与大学生谈实现中国梦的自信和自觉

陈锡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与大学生谈实现中国梦的自信
和自觉/陈锡喜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834-8

I. ①政… II. ①陈… III. 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中国 IV. ①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186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设计 范昊如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

——与大学生谈实现中国梦的自信和自觉

陈锡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834-8/D·2366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总 论	实现中国梦的理论自觉	1
	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确立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1
	（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国梦的实现	1
	（二）实现中国梦的主观条件	4
	（三）理论自觉是道路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	6
	二、确立理论自觉需要划清基本理论界限	8
	（一）划清基本理论界限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要求	8
	（二）意识形态领域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14
	三、划清基本理论界限需要有科学态度	19
	（一）发展视野：基本理论界限的动态性与历史性	19
	（二）辩证思维：基本理论界限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21
	四、在划清基本理论界限中确立社会理想信念	26
	（一）执政党：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26
	（二）大学生：承担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28
第一章	国家政治生活的思想灵魂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32
	一、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和团结奋斗的理论基础	32
	（一）理论优势：建立在实践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批判学说	33

(二) 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	39
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	50
(一) 历史定位:传承人类文明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性真理	50
(二) 理论定位: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理论展开	58
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69
(一) 路径:提升理论思维能力	69
(二) 方法:掌握立场观点方法	72
(三) 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74

第二章

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创新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上)	77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78
(一) 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探索和创新 的重大成果	79
(二) 前进方向:事关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84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98
(一) 马克思的预测:公有制理论及其实现过程	98
(二) 所有制优劣:判断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和人的解放	110
(三) 认识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结构的新内涵	114
三、确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信念	117
(一) 两种所有制:现状和相互促进关系	117
(二) 分配形式:收入分配差距和“先富”“共富” 关系	120

第三章 政治发展道路的文明共性与中国特色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下)	128
一、中国政治制度选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128
(一) 政治自主:避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	128
(二) 独特道路:中国现行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轨迹	130
(三) 比较优势: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133
(四) 澄清误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与反腐败问题	139
二、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和民主制度的历史性阶级性	144
(一) 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制度的民主思想	145
(二) 制度层面:中国政党制度与政体的特色与合理性	149
(三) 个人层面:民主、自由、人权的共同性与差别性	159
三、坚定不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64
(一) 审时度势:把握世界与中国政治发展潮流	165
(二) 人民主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	167
(三) 基本途径:改进、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171
(四) 由点到面: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172
(五)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保障	174

第四章 人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软实力”

——确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178
一、建设中国先进文化需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178
(一) 时代前列: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79
(二) 应对挑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82

(三) 正视现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	189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193
(一) 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194
(二) 腐朽思想文化:对人的解放的背离	198
三、在划清基本界限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01
(一) 繁荣基础:尊重文化多样性	202
(二) 文化传承: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06
(三) 文化吸纳:站在世界文化发展进步的潮头	210
结 语 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	213

总论

实现中国梦的理论自觉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使用“中国梦”这一概念来表达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他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①我们应该具有实现这一“中国梦”的自信,而这一自信,又需要有理论自觉为基础。

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确立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所谓“中国梦”,就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宣告的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这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恰巧与两个100年相关,这就是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可预期的将来,也就是这两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

(一)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国梦的实现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可

^① 《百年奋斗铸就历史辉煌 信心百倍推进复兴伟业》,新华社北京2012年11月29日电。

以断言,中华民族复兴的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是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正如习近平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和时代潮流,重新提了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确立的,因“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到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然而,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随着对国情以及“十年动乱”造成破坏严重性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意识到,再过20年是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于是,他开始重新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对这一目标进行了调整,他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②。对于这一目标,邓小平又考虑分两步走,即前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这一设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被作为战略任务确定了下来。经过几年实践,这一设想被证明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同时为了增强战略任务的连续性和预见性,邓小平又提出第三步战略目标。1987年4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③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邓小平设计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步骤:第一步,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

① 《百年奋斗铸就历史辉煌 信心百倍推进复兴伟业》,新华社北京2012年11月29日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与1958年“大跃进”中提出的15年里主要工业产品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超越现实可能的目标,以及1964年底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相比,“三步走”发展战略所具有的鲜明特点是:其一,既宏伟,又不过急,而是从实际出发、发展速度适当、经过艰苦奋斗切实可行的目标;其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具有量化的科学性和步骤的明确性,既讲国内生产总值,又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进行国际比较,体现了实现现代化的自信;其三,其中每一步,都既有经济指标,又有人民生活指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1995年已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预期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指日可待。于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新世纪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新的前瞻性战略思考。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21世纪头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900美元,总体上达到了邓小平原设想的“小康社会”目标。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新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年里翻两番的任务。

到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000美元,头10年就实现十六大确定的20年翻两番任务,更达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21世纪前30年至50年要达到的经济总量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生活上的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如果能在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在经济生活上,2020年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4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接近于1.5万人民币,则基本达到民富国强。这就为再过3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因此,实现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关键是前一个目标能否实现。而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发展所走过的道路看,经过艰苦努力,到建党 100 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要实现 10 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年增长率只要达到 7% 以上即可,而 30 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接近 10%。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会下降,粗放型的大规模投资也不可持续,但中国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进展,可拉动基本消费,而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水平的逐步提升,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会迅速发挥,加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成为上下相通的共识,国内生产总值再稳定增长 10 年,是可以预期的。其必要条件,是社会总体上的稳定。同时,只要分配和社会政策有必要的调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10 年翻番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

(二) 实现中国梦的主观条件

问题在于,两个翻番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并不是无条件的。无论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番所需的社会稳定,还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所需的社会政策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引入超越经济因素的保障因素。特别是建党 10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过程,还会遇到各种新的风险考验和各种思潮的干扰。因此,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提出的两个主观条件,一是精神状态,即顽强、艰苦、不懈地奋斗,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实干兴邦”;二是信念,即确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所谓“道路自信”,其一是坚信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既有独特性,又蕴含着丰富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因为这条道路既摆脱了斯大林的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高度同一、社会上高度统一因而缺乏活力和效率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没有照搬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盛行商品拜物教甚至货币拜物教,而且以强权建立起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现代化模式,它首先是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同时又是符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其二是坚信在我们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这一道路能使我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从而以此既坚定方向,又随时调整政策,做到应对自如、攻坚克难。

所谓“理论自信”,其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它的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彻底批判性的理论特性,具有对现实的穿透力,其异化劳动批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等理论内容,依然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是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指导原则,是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下世界矛盾的方法论指导,是人类朝着自身解放努力的精神力量;它可以赋予中国道路和经验以理论特色,把握中国社会朝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前进的方向。其二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因为这一理论体系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关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乃至人类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所谓“制度自信”,其一是坚信我们形成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发展

成就的制度化体现,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坚持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可以避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行合一制度,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相对分立又相互协调,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全面完整的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可以造就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人才。其二是坚信,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可以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政治文明。因为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既有人类的共同性,也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尽管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它毕竟既符合当下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总体上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发展进步。

(三) 理论自觉是道路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关系,有两个层面:一是形成关系,也就是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道路的开辟决定了理论的创新;二是功能关系,即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这些关系统一于实践,是客观的关系。

而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是对实践发展必然要求的自觉反映,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因而理论自信对于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言,是基础。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涉及政治信念和立场问题。而立场坚定取决于思想清醒,思想清醒则取决于理论彻底。我们的理论在面对道路和制度的坚持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考验和思潮干扰时,只有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更准确地揭示实际问题、更深刻地批判社会矛盾、更科学地把握未来价值,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才能不畏任何风险所惧,并避免走老路或邪路的干扰诱惑。

今天,确立理论自信,并不是“自信”马克思的本本中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各种问题的现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

案,也不能仅仅依靠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等经验事实为根据,而是需要有理论自觉,即对理论的自觉反思,既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所鼓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性思维,又摒弃斯大林教条主义所规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单一性思维。摒弃这两种由单一性道路上升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绝对普遍性的思维,我们才能够在承认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前提下,“自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彰显当代价值和比较优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从而为回答社会现实热点、思想理论难点和群众困惑疑点,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有这样以理论自觉为基础的理论自信,才能做到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增强与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能力,从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确立理论自觉,须划清一些基本的理论界限,通过理论命题的清晰,为在道路、理论和制度方面政治价值的认同提供思想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②由于道路的选择、探索和坚持,

①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2013年1月5日电。

②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新华社2012年11月17日电。

由理论作指导,道路的实践成果凝聚为制度,因此,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需要划清的一些基本理论界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其中第一个界限,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第二、第三个界限,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凝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第四个界限,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需要的文化自觉。

二、确立理论自觉需要划清基本理论界限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在思想上划清基本的理论界限的命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提出划清基本理论界限的命题,是为了做到思想清醒,从而立场坚定。

(一) 划清基本理论界限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要求

这些基本理论界限涉及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集中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它的提出,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意识形态问题重视的一贯性和思想理论建设的连续性,又体现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特点和中央对思想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了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

基本路线奠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抓全党的思想解放，强调要把我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①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针对社会上极少数人散布的要把改革开放引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思潮，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正式被选为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针对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挑战，反复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理论斗争”^②。根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战略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变化给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的新课题，他具体提出了研究“四个如何认识”的重大任务，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③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更注重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理论建设。胡锦涛强调：“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提出新的思路和要求，如厘清中国特色社会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③ 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2页。

④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8日。

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重大问题”(即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六个为什么”问题(即李长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乃至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划清“四个界限”。

对于划清四个基本理论界限的重要性,应该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以及近些年提出的“四个重大问题”和“六个为什么”等命题结合在一起,既要着眼于政治认同的大方向加以认识,又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遇到新挑战的视角加以理解,在十八大召开后的今天,还要站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以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加以体会。

划清四个基本理论界限,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与其他三个界限之间是“一总三分”的关系。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放在首位,是因为它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事关立党立国的精神支柱,直接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重大是非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问题。而后三个需要划清的基本界限,则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最根本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